

主 編 楊世鈺 趙寅松

本篇主編 和生弟 王水喬

大理叢書·史籍篇

卷一

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 編

雲南民族出版社



主編 楊世鈺 趙寅松
本篇主編 和生弟 王水喬

大理叢書 · 史籍篇

卷一

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 編

雲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理丛书·史籍篇/和生弟,王水乔主编.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367-5221-4

I. ①大… II. ①和… ②王… III. ①大理白
族自治州—概况②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史—史籍
IV. ①K927.42②K29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3045 号

DALI CONGSHU · SHIJI PIAN
大 理 丛 书 · 史 籍 篇
和生弟 王水乔/主编

策划编辑 高力青 岳 坚 杨红英 杨浩林
责任编辑 奚寿鼎 段 波
封面设计 何志明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 650032)
邮 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刷 云南省地矿测绘院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总 印 张 526.5
总 字 数 8600 千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

ISBN 978-7-5367-5221-4/K · 1386 定价: 11180.00 元 (共 13 卷)

《大理叢書》

主編 楊世鈺 趙寅松

《大理叢書·史籍篇》編輯委員會

本篇顧問 郭惠青 黃德榮 趙濟舟 李彪

主編 和生弟 王水喬

副主編 趙潤琴 趙克選 林滋平 計思誠 郭勁

編委（按姓氏筆畫為序）

丁達賢 田懷清 石維良 李公 杜新燕 宋弘麗

吳蘭香 唐俊 張雲霞 楊建偉 楊萌 楊海青

楊曉霞 楊麗娟 趙樹興 蔣興中 劉純潔 嚴春華

英文翻譯 陳果

《大理叢書·史籍篇》主辦單位和協辦單位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
雲南省圖書館 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學會
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詔史研究會

序 一

尹 俊

在中華文明發展史的長河中，以洱海為中心的大理地區占有一定的地位。文明是人類的物質生產和社會生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表示人類社會從氏族制度解體，進入有國家組織的歷史階段。史學界一般把夏代作為中國社會進入文明階段的開始。衆所周知，文明是由『野蠻』的新石器時代的人們創造出來的。雲南迄今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在洱海東部賓川縣發掘的白羊村遺址，它證明文明因素在洱海周圍開始萌生了。一九五七年發現的洱海北劍川海門口青銅器文化遺址，表明大理地區早在殷代晚期就已開始跨入文明社會的大門。一九六三年在洱海東南祥雲縣大波那發現距今二千三百五十年的木椁銅棺墓，證明洱海地區已出現國家的雛形。中華文明是指中華歷史文化的主體而言的，但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華文明并不是指單一的漢族文化，而是包括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所有成員的優秀文化。因此，大理地區的文明史，也是中華文明史有機組成的一章。長期生息、繁衍、活動在大理地區的白、彝、回等各族人民，用自己的勤勞智慧創造的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也是構成中華民族光彩奪目的文化殿堂裏的一塊瑰寶，對中華文明的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大理地區在歷史上有『文獻名邦』之稱。早在秦漢時期，大理地區就是我國通往外界最早的通道——南方陸上絲綢之路的樞紐。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一〇九年），漢武帝在大理地區設置葉榆（大理、賓川、洱源、劍川）、雲南（祥雲）、邪龍（漾濞南及巍山、南澗等地）、比蘇（雲龍西北部）、嶺唐（雲龍西部）五縣。東漢永平十二年（公元六九年）將洱海地區五縣并入新設的永昌郡，并增設博南縣（永平及其南部廣大地區）。蜀漢時期，諸葛亮在今大理州、楚雄州及麗江地區的部分縣設置雲南郡，兩晉因之。東晉以後，白族先民『西爨白蠻』貴族在今雲南大部分地區稱雄達數百年，而始終遙奉中原王朝正朔。相當于唐宋兩代的南詔和『大理國』，自覺主動地接受中原地區的典

章制度和禮樂文化，使大理成為雲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達五百年之久，把雲南的社會經濟文化推進到『與中夏同』的水平。南詔、大理國又同東南亞、南亞諸國進行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成為我國西南陸上通向世界各國的橋梁。漢藏文化與包括今印度、緬甸、越南、柬埔寨、泰國以至中亞地區各國在內的佛教藝術、哲學思想，在這裏交匯、融合，成為巨流，又以更新的内容向四方幅射，極大地影響了雲南全境及鄰近地區歷史文化的發展。大理國時期，雲南的農業、手工業和社會文化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和繁榮。大理國向中原地區輸出了許多精美的工藝品、貴重藥材和宋王朝抗擊金兵的戰馬以及佛經等，又從內地輸入了手工業品和大量的漢文書籍，其中包括醫藥、天文、軍事、五經、三史和文學等著作。白族知識分子很早就學會了漢文，用漢文寫文章、詩詞，在白族語言中也吸收了大量漢語詞匯。這種歷史發展中的相互促進，為元代以後中央封建王朝在雲南設置行省奠定了物質文化基礎。

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由於國內和國際歷史條件的變化，大理地區各族人民為反對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鞏固祖國西南邊疆，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歷史上白族先民分布于洱海以至滇池一帶內地的平壩河谷地區，接受先進的漢族文化較早較多。通過白族的媒介作用，漢族的農業、手工業生產技術和中原地區的精神文化傳播給雲南境內的其他各族人民，以至周邊國家的人民，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進一步發展和中外文化的廣泛交流。

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白族是一個寬容大度和親仁善鄰的土著民族。白族善于團結境內其他各族人民。歷史上白族先民白蠻名家大姓張建成、段忠國、楊牟利等曾協助南詔蒙氏兼并五詔和統一雲南。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內，自古來以白族人口為最多，彝族次之，元代遷來的回族又次之，還有人口較少的其他各族人民。一八五六年回族杜文秀在大理建立反清政權，受到白族人民的支持。與此同時，彝族農民李文學在彌渡縣瓦盧村誓師起義，同樣受到白族人民的支持。盡管清政府施展『以夷制夷』的手段，從中挑撥離間，使起義歸于失敗，但白、彝、回各族人民通過這兩次反帝反封建鬥爭加強了友誼和團結。

一九八二年，大理被國務院命名為首批全國二十四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同時也是我國四十四個對外開放的風景名勝地區之一。在國家的大力扶助下，大理各族勞動人民以嶄新的姿態，精心保護修復名勝古迹，大力搜集整理古代文化藝術遺產，使大理地區以其光輝璀璨的文化古迹，旖旎迷人的風景名勝而蜚聲中外。隨着國家加快改革開放步伐，進一步擴大對外文化交流，我們在廣納博取地吸收人類文明一切優秀成果的同時，也要以積極主動的態

度，向世界各國介紹中國悠久的民族傳統文化，以增進各國人民對中國的了解。為此《大理叢書》編輯委員會從一九八八年以來，經過多年艱苦的工作，對大理地區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進行了系統的搜集整理，分門別類，將自古以來大理地區歷史文化之精粹，分編為《金石篇》《大藏經篇》《藝術篇》《方志篇》《建築篇》《考古文物篇》《族譜篇》《本主篇》《史籍篇》《白語篇》十大專輯，分期分批出版，全面系統地介紹給全國、全世界人民，以期海內外廣大讀者能從中充分領略大理這顆東方藝術明珠的神奇魅力。同時，希望通過《大理叢書》的問世，能為學者研究中國西南古代史、民族史、文化史提供翔實的材料，以達到密切中外文化交流、增進互相了解、共同推進人類文明進步的目的。

一九九三年七月

序 二

馬曜

中華文明是以漢族為主體包括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所有成員共同創造的。文明一詞既是指文化，又是指與『野蠻』相對的人類社會進步狀態。以洱海為中心的大理周圍地區在雲南古代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海門口為標志的殷末洱海文化向東發展形成以石寨山為標志的戰國到西漢的滇文化。在滇文化基礎上吸收東來的漢文化，又形成滇中和滇東的西爨文化。隋唐以後爨文化又西移洱海地區，形成南詔文化和大理文化。以上幾種文化是雲南文化的主流。它們之間有着縱向傳承和橫向交流的關係。讓我們簡略地回顧一下三千年來大理文明的形成和發展歷程。

洱海為中心的大理周圍是雲南文明的發祥地

人類文明是由『野蠻』的新石器時代的人們創造出來的。中國文明的多中心不平衡發展，在史前文化中表現得最為突出，特別在雲南延續時間最為長久。雲南舊石器文化的超前與滯後，可以從一九六五年雲南元謀縣上那蚌村發現距今一百七十萬年或五十至六十萬年的元謀人^①和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七年一月雲南省博物館、保山地區文物管理所、保山市博物館人員在保山縣蒲缥河北岸塘子溝發現距今七千年舊石器晚期遺址得到說明。這是同雲南處于過渡地帶的地理環境和生態因子多而復雜的特殊條件分不開的。越是早期，地理環境對人類的制約性越大。在新石器時代，文明是多中心的，往後黃河流域逐漸趨于領先地位，中華文明從多中心逐漸變成單中心，又向四周輻射。離中心愈遠，影響越弱。在雲南，古代文明是從洱海周圍向滇池地區發展的。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在洱海東部賓川縣賓居鎮白羊村發掘出土距今四千多年的原始社會稻作聚落，是雲南迄今發現最早和具有代表性的新石

器文化遺址。同類遺址在大理、祥雲、洱源、雲龍、劍川、鶴慶等地都有發現。^② 早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吳金鼎等曾對洱海西岸的佛頂、馬龍等新石器文化遺址進行了發掘。^③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又在洱海東岸金梭島、鹿鵝山、大墓坪和五裏橋等地發現了新石器和陶片。稍後于洱海的新石器文化是元謀縣大墩子新石器文化遺址，距今約三千五百年到四千年。而滇池周圍晉寧、昆明官渡等地的新石器遺址，其絕對年代上限不超過三千五百年。從白羊村、大墩子到昆明周圍的新石器文化，都是以發育稻作的河谷和湖濱盆地為經濟中心的文化，彼此之間有着共同性和連續性。

以黃帝為代表的仰韶文化，通過涵蓋大部分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的大溪文化進入雲南。司馬遷在《史紀·五帝本紀》中記載黃帝長子青陽降居江水（長江上游），次子昌意降居若水（雅礱江）。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顓頊。今雲南、四川藏緬語各族均盛行幼子繼承制，不可能與此無關。考古發掘還證明，早在新石器時期，仰韶文化西支馬家窑文化和齊家文化已南下經過巴蜀到達今雲南腹地地區。大理馬龍遺址的半地穴式房屋，與甘肅馬家窑和西安半坡相似；白羊村和大墩子平地起建的土木結構房屋，甚至與陝西廟底溝和河南洛陽王家灣遺址接近，大理馬龍遺址的陶器刻符與西安半坡遺址、馬家窑文化（馬廠類型）、寺窪文化類似；白羊村出土的帶耳、帶流、高頸的陶器屬於齊家文化類型。在馬龍峰下還發現華夏文化標志的陶鼎殘足。與此同時，司馬遷也注意到古越文化溯西江而上到達夜郎以西的滇東南以至滇西的情況，《史紀·西南夷列傳》說：『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同師』在今保山地區。從一九八六年在保山塘子溝發掘出距今七千年的舊石器文化遺址來看，雲南與東南沿海以至東南亞的文化聯系已經很早了。

海門口到石寨山——滇文化的形成

真正的『文明』一詞表示人類社會從氏族制度解體，進入階級社會組織的歷史階段，也就是由新石器時代進入青銅器時代。史學界一般認為中華文明開始于公元前一五〇〇年至公元前一九〇〇年的二裏頭文化時期。在雲南，約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也出現了文明的萌芽。一九五七年在洱海北部劍川縣海門口發現距今約三千年的青銅文化

遺址，相當于商代晚期，這是雲南迄今發現最早的青銅文化。遺址出土銅器有十四件，其中九件是青銅器，有銅鉞、斧、鐮、鈎、鑿、錐、針、鐳等。還有人工栽培的粳稻。出土石器農業生產工具達一百五十件之多。海門口遺址標志着洱海地區新石器文化向青銅器文化的過渡，由原始公社跨進了階級社會的大門。在以後發掘的劍川沙溪東周墓葬中，也出土一些青銅器，可見滇西一帶是雲南古代制造銅器較早的地區。一九六三年，在祥雲縣雲南驛大波那發現戰國中期距今約二千三百五十年的一座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內有巨木疊組的井幹式結構的椁室，椁內有一具長達兩米由七塊銅板組成的銅棺。棺內銅器有鋤、鑄等農具和一些紡織工具；兵器有矛、劍、啄、鉞、鐃等；生活用具有釜、杯、尊、勺、豆、匕、箸等；樂器有銅鼓、葫蘆笙、鐘等。棺內有一面象徵權力的銅鼓和一根銅權杖，推斷墓主人不僅是一個奴隸主，而且是當地農耕民族的政治領袖。^④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在楚雄萬家壩出土早于祥雲的春秋至戰國中期的墓葬七十九座，其中二十八座有隨葬的生產工具、兵器等，出土青銅農具達一百四十七件。商周青銅器多為兵器、食器、酒器、禮器。青銅農具很少。而雲南墓葬中出土青銅生產工具特別是農具很多，說明農業生產已經擺脫石器時代的原始農業，真正過渡到標志生產力發展新水平的青銅時代。其中相當于春秋時期的第一期墓葬出土青銅短劍和銅矛接近洱海地區，早于祥雲大波那遺址。萬家壩出土五件目前所知時代最早的銅鼓，還出土一套羊角紐編鐘，兩者都是用以標明奴隸社會中奴隸主身份等級的器物。從萬家壩和大波那出土的銅鼓、編鐘和權杖，證明滇洱之間已出現國家雛形的組織。《史記·秦本紀》說：「（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三一六年），司馬錯伐蜀，滅之……十四年，丹、犁臣蜀……武王元年（公元前三一〇年）……伐義渠、丹、犁」。按張守節《史記正義》雲：丹、犁，『二戎號也。臣服于蜀。蜀相殺蜀侯，并丹、犁二國降秦，在蜀西南姚府管內，本西南夷，戰國時屬滇國，唐初置犁州、丹州也。』丹、犁在姚州境內，即今祥雲、楚雄一帶，大波那和萬家壩墓主距今二千三百年至二千五百年，相當于秦惠文王、武王之時，或即丹、犁二國之王。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〇年，在晉寧石寨山進行了四次發掘，出土文物四千餘件，其中青銅器二千件以上，有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兵器、樂器等；一九七二年，在江川李家山發掘和清理古墓二十七座，出土文物一千三百餘件，與石寨山遺址屬于同一類型。大量出土文物表明，司馬遷在《史記》中所稱的『滇越』人以農業為主要經濟部門，使用青銅的鐮、鋤、斧等農具，主要勞動力是婦女，種植稻谷，不知牛耕，生產上處于鋤耕農業階段。畜牧業也較

發達，家畜有牛、馬、豬、犬、山羊、綿羊，牛的數量最多，還從事捕魚，撈螺螄和狩獵。手工業能制造青銅器、鐵器、金銀器、玉石器、漆器、皮革、紡織品和陶器，青銅冶鑄業最爲發達，銅錫配合比例恰當，工藝水平很高，青銅器表面的鑲金、錯金、鍍錫或鑲嵌玉石，十分精緻和美觀。一些兵器及其他器物上附飾有立體或半立體的人物和動物形象。七件貯貝器上塑鑄有複雜的人物活動場面，表現人們從事戰爭、祭祀等活動。人們盛行集市貿易，并與四川等地交往，輸入絲織品、銅鏡、弩機等，輸出牲畜和畜產品，賣出奴隸『滇僮』『犍僮』。^⑤ 作爲貨幣的家畜是牛，從南海傳人的外來交換品則是海貝，有大批海貝放置貯貝器中作爲隨葬品。青銅器上的人物圖像表明，滇池地區已進入比較發達的奴隸制，出現奴隸主貴族、平民、奴隸三個階級。奴隸主不勞動，指揮戰爭和祭祀，平民從事農業和畜牧業，是生產和貢賦的主要承擔者。奴隸主要來自戰爭中的俘虜。一件貯貝器上鑄有十幾個女奴在一個女奴隸主監視下進行紡織。三件表現祭祀場面的青銅器，鑄有以人爲祭，有一次共殺四人。^⑥ 以石寨山爲代表的青銅文物，外形對稱勻整，花紋精緻繁褥，表明雲南青銅文化已發展到了最高階段。

從海門口到石寨山，貫穿着一條從初期青銅器文化逐步發展到成熟的青銅文化的內在聯系，具有鮮明的地方民族特點。例如，刃部稍寬大的青銅斧與平面呈梯形的石斧形狀相類似；青銅圓刀鉞可以追溯到海門口的紅銅鉞，等等。不論以母系社會爲標志的雲南新石器文化或繼起的以奴隸社會爲標志的雲南青銅器文化，都顯示出一條從洱海周圍經楚雄地區向滇池地區發展的綫索。所有上述新石器和青銅器都分布于湖濱河谷平壩地區，這種文化的主人是『椎髻、耕田，有邑聚』的『靡莫』^⑦或『靡非之屬』。^⑧

石寨山青銅器文化的上限爲春秋晚期或戰國初期。史載莊蹻率領楚國農民起義軍數千人到達滇池，已是戰國末年。^⑨ 是時滇池地區農業和手工業已有一定的發展，『靡莫之屬』的『滇僮』人已在滇池周圍壩區開墾出『肥饒數千裏』的土地。莊蹻及其從人帶來了先進的荆楚文化，但他們不能用暴力改變滇池地區正在上升的奴隸制度，而祇能『變服，從其俗，以長之。』雖然如此，雲南青銅文化中已有不少器物如靴形銅斧、寬刃短銅劍等在湖北都有出土。《楚辭·天問》中『水濱之木，得彼小子』與《華陽國志·南中志》（亦見《後漢書·西南夷傳》）所載『九隆神話』相類似。莊蹻勢力向滇西發展，故有『自夜郎滇池以西，皆莊蹻之裔』的說法。^⑩ 今之楚雄亦稱『威楚』，當與楚人西遷有關。唐代宗大歷元年立的《南詔德化碑》說，閣羅鳳之弟『誠節不忠不孝，貶在長沙』。《蠻書》卷五

說，長沙指白崖城南二十裏的『蠻子城』。碑文又說：『侯隙省方，駕憇于洞庭之野』，洞庭實指滇池。這都說明滇楚關係是很密切的。

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一〇九年），漢武帝擊滅與滇王『同姓相扶』的勞浸、靡莫，在雲南設立益州郡，『以其故俗治』，^⑪令滇王復長其民，因而以石寨山為代表的滇文化，在西漢時期得以繼續發展。但是，隨着郡縣制度的加強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得其所欲』，^⑫四川鐵器大量進入雲南。早在大波那和萬家壩遺址中，就出現豆、匕、箸和編鐘等中原器物。石寨山遺址中除了西南民族固有的樂器如銅鼓、葫蘆笙、銅鑼等外，還有從巴蜀傳來的于鐸編鐘（共六枚，大小遞減）。青銅器圖像所表現的舞蹈豐富多彩，有類似今天滇西北彝、白等族的『鍋莊舞』，也有類似今天傣族的孔雀舞，還有羽舞、盾牌舞等。遺址中純漢式的器物也不少，如銅鏡、弩機、鏃門、鐘、釜、熏爐、各種錢幣和漢印，除著名的『滇王之印』外，還發現『勝西印』和『王牢（？）私印』。江川李家山也發現『李德』、『黃義印』、『壽之人』漢印三方。經過新莽時滇池地區爨人大起義和文齊的治理，東漢時期漢文化得到進一步傳播，明帝時益州太守王阜在滇池地區『興起學校，漸遷其俗』。^⑬昭通地區發現的『孟孝琚碑』記載：『孝琚受《韓詩》，兼通《孝經》二卷』。《華陽國志·南中志》也說今昭通地區『其民好學，多士人』。當時漢文化主要是通過宜賓到昭通進入雲南的。如朱提（昭通）、堂狼（會澤）、巧家）洗常以雙魚為圖案，『孟孝琚碑』上端殘缺，周圍有龍紋及魚紋，與內地常見的『四神』圖案中的龍龜書法一樣。『梁堆』出土的花磚和一些雕刻，都屬於內地風俗。總之，到了東漢時期，以石寨山為代表的滇文化，除銅鼓外，幾乎蕩然無存了。滇文化的斷裂和滇王國的消亡是和石寨山青銅文化的衰落分不開的。

西爨到南詔——雲南文化中心的西移

由海門口到石寨山的滇文化基本上是雲南土著民族的文化，其中既吸收了中原的氐、羌、巴蜀、荆楚和百越文化成份，又吸收了東南亞和南亞文化成份。從東漢開始，在以滇池和洱海為中心的內地壩區，東來的漢文化逐步占居主導地位。雲南的文化中心從滇中向滇東發展。東漢後期南中大姓崛起，其中與楚同姓的南中『方土大姓』爨氏

在古滇國故地（今晉寧縣）形成勢力，其代表人物爨習于東漢建安十六年（公元二一一年）任建伶（今晉寧縣昆陽）令，^⑭ 後降蜀官至領軍。唐樊綽《蠻書》卷六云：『晉寧州（今晉寧縣），古滇池故地也……西爨王墓，累累相望。』滇王墓葬與西爨王墓葬俱在晉寧縣境，滇王式微而系出于『𑖀』的爨氏興起，二者之間當有一定的淵源關係。自爨習以後逐漸發展，至七世祖爨琛『事晉爲南寧州太守，屬中原亂，遂王蠻夷。』^⑮ 西爨繼滇國之後，興于漢魏，盛于晉宋，擅命于齊梁，竊據于隋唐，獨步八代之間，綿延達五百年之久，在雲南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首先，它在中原分裂戰亂中保持偏安南中的局面，未受到來自外部的幹擾，使兩晉時期瀕于殘破的雲南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北周時南寧州『戶口殷實，金寶富饒』^⑯ 到了唐代，今曲靖以西的西爨地區（壩區）已是『邑落相望，牛馬被野』。^⑰ 其次，西爨統治者大量吸收漢文化，促進各民族的融合。史載西晉太安元年（公元三〇二年）的寧州是『南中形勢，七郡門絕，晉弱夷強。』^⑱ 過了一百七十多年，經過東晉戰亂，南齊初（公元四七九年）的寧州（今雲南）仍是『道遠土瘠，蠻夷衆多，齊民（漢人）甚少』，^⑲ 而僅僅過了一百年，到了北周末（公元五八一年）的南寧州，已是『其地沃壤，多是漢人』。^⑳ 上引『漢人』指『西爨白蠻』。漢晉時期入滇的漢人，多融合于爨氏，^㉑ 即後來的『西爨白蠻』之中，同時也促進了『西爨白蠻』的漢化。再次，西晉太安二年（公元三〇三年）前後的寧州戰亂，引起滇東包括叟人在內的編戶屯民大量遷往滇西，^㉒ 西爨勢力也繼續隨之向洱海地區發展。

隋唐之際，洱海地區分布着與『西爨白蠻』同族屬的『河蠻』和烏蠻『六詔』，前者居住于洱海周圍的壩區，後者主要居住于山區和半山區。史載唐初『河蠻』的社會情況是：『鬆外諸蠻，大唐貞觀末爲寇，遣兵從西洱河討之。其西洱河從嵩州西千五百裏。其地有數十部落，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戶，無大君長，有數十姓，以楊、趙、李、董爲名家（《新唐書》作貴族），各據山川，不相役屬。自雲其先本漢人。有城廓村邑，弓矢矛鋌。言語雖小訛舛，大略與中夏同。有文字，頗解陰陽歷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曰莊蹻之餘種也。其土有稻、麥、粟、豆，收穫亦與中夏同，而以十二月爲歲首……』^㉓ 這裏所記居住于今大理太和至喜洲一帶的『西洱河蠻』，『自雲其先本漢人』，說明當時已蛻變爲土著民族，可與『皆曰莊蹻之餘種』相印證。莊蹻以後的南中大姓都是少數民族化了的漢族和漢化了的少數民族。這是因爲民族既是相對穩定的共同體，又是不斷變動的實體。《王仁求碑》說：『太伯逃吳，文身之風既習；少卿降虜，毳幘之化無違。』說明明代以前遷來雲南的漢人，大都『變服從其俗』，『西洱河蠻』

大姓，多是少數民族漢化或漢族少數民族化。他們漢化程度頗深，顯然是以《爨龍顏碑》和《爨寶子碑》為代表的西爨文化向洱海地區發展的結果。又《新唐書·南蠻傳》說：『西洱河蠻，亦稱河蠻』，但『河蠻』也包括居住于洱海東部今大理鳳儀、賓川一帶的『東洱河蠻』。後『西洱河蠻』北徙于劍、共諸川（今劍川至鶴慶、麗江一帶），而『東洱河蠻』則未徙。《蠻書》卷五說：『渠斂趙（今大理鳳儀），本河東州也……大族有王、楊、李、趙四姓。』河東即洱河（海）之東。河蠻分布于洱河東西，各有大姓首領。據《爨龍顏碑》碑陰，西爨區域東抵貴州西部；直到唐初還包括洱海地區及其北部的『鬆外諸蠻』在內^②，比《蠻書》卷四所說從石城（曲靖）到龍和城（祿豐大腰站）的西爨區域大得多。隋史萬歲擊西爨，先到洱海地區，再到滇池，可以為證。天寶年間南詔崛起，向東發展勢力，西爨統治區域相對縮小。但洱海周圍平壩地區的居民在族屬和文化上屬於西爨白蠻。當時東西洱河蠻的社會經濟已達到『與中夏同』的水平。

關於六詔，《新唐書·南蠻傳》說：『爨蠻西，有昆明蠻，亦曰昆泚，以西洱河為境，即葉榆河……逐水草而居，夏處高山，冬入深谷，尚戰死，惡陣亡，勝兵數萬。』『昆明蠻』為六詔前身，即《史記·西南夷列傳》中的『昆明』人。唐初仍從事游牧，正處於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的軍事民主主義階段，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遠較河蠻落後。

唐貞觀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遣梁建方從西洱河擊『鬆外蠻』（今永勝、華坪一帶），在擊敗為首的部落貴族雙捨後，派人招降河蠻，先後來附者七十部，十萬九千三百戶，連十分懼怕想上船逃走的西洱河首領楊盛，也被說服投降。^⑤又貞觀二十二年，西洱河大首領楊同外、東洱河大首領楊斂、鬆外首領蒙羽皆入朝，授官秩。^⑥顯慶元年（公元六五六年）西洱河大首領楊棟歸附。^⑦當是這次戰役的結果。在稍前的永徽初年（公元七世紀中），左領軍將軍趙孝祖徵『白水蠻』，遂至大小勃弄（今祥雲縣），斬小勃弄酋長歿盛，執大勃弄首領楊承顛。^⑧武則天延載元年（公元六九四年），洱海地區首領董期率所部二十餘萬戶內附。^⑨睿宗景雲元年（公元七一〇年），監察御史李知古又擊『西二（洱）河蠻』。^⑩唐初『河蠻』特別是『西洱河蠻』受到唐王朝的多次重大打擊，勢力遂衰，六詔乃乘時而起。

六詔并存時期始于唐武後永昌元年（公元六八九年）至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八年），先後五十年。六詔

中的越析詔是今納西族先民，其地在今賓川縣賓居街，隋初即已出現。次爲南詔，在巍山縣南，自言爲哀牢之後，貞觀初始居蒙捨川。蒙寓詔地在陽瓜州，《王仁求碑》載陽瓜州刺史蒙儉，當即蒙寓詔主。浪穹詔在今洱源縣。武後永昌元年，傍時昔以二十五部去吐蕃降唐，任浪穹州刺史。《蠻書》卷三載，「澄賧，一詔也，主豐咩」。『施浪，一詔也，詔主施望欠。』初居鄧川，後爲浪穹詔所奪。後施浪詔遷于浪穹東北蒙次和山東北一帶。『浪穹詔豐時、豐咩兄弟俱在浪穹，後豐咩襲鄧賧居之，由是各爲一詔。』

南詔是以『烏蠻別種』^②貴族和白蠻大姓（貴族）聯合建立的政權。據《南詔德化碑》題名，這個政權中的清平官、大軍將，白蠻占多數，還有後來的三十七部和今傣族貴族首領。在南詔出現之前，洱海南部地區（今彌渡、巍山、南澗一帶）爲白蠻張樂進求統治的『白子國』（亦稱『白國』『白崖國』『雲南國』『建寧國』等）。據胡蔚《南詔野史》『建寧國』（不是東晉成帝咸和八年李雄陷寧州建立的建寧國）云：『後漢諸葛武侯南徵……乃封白子國王仁果十五世孫龍佑那爲酋長，賜姓張氏，于白崖築建寧城，號建寧國，立鐵柱……後張龍佑那仍遷國澄江，傳三十二世至十七世孫張樂進求，唐太宗己酉貞觀二十三年，封爲首領大將軍。後見蒙捨川蒙細奴邏有奇相，遂妻以女，遂國與之。』這段記載中顯然有附會成分，但也有合理因素。東漢末年，洱海地區『有上下方夷……土地有稻田畜牧，但不蠶桑。』^③『上方夷』是分布于山區的烏蠻，即後來的六詔。『下方夷』是分布于河谷壩區的白蠻，即後來的『河蠻』。當時洱海地區附屬蜀的永昌郡，諸葛亮雖不到滇西，但在已具備設郡條件的洱海地區新設立了雲南郡（治雲南縣，即今祥雲縣），實行土流兩重統治，『即其渠帥而用之』，^④封當地酋長龍佑那爲酋長，以呂凱爲雲南郡太守。現存日本京都府有鄰館的《南詔中興二年畫卷》^⑤（以下簡稱《畫卷》）曾繪有白子國爲其鄰近的南詔取代的故事，可爲佐證。《畫卷》中記載唐初洱海地區的『白蠻』和『烏蠻別種』同屬於一個部落聯盟。據上引張樂進求妻細奴邏以女來看，當是親屬部落聯盟。這個聯盟以白子國王張樂進求爲盟主。《畫卷》中有文字說明：『按《張氏國史》云：雲南大將軍張樂盡（進）求、西洱河右將軍楊農棟、左將軍張矣牟棟、巍峰刺史蒙邏盛、助公大部落主段字棟、趙覽字、施棟望、李史頂、王青細莫等九人共祭鐵柱。這九人中，有八人按姓氏當爲白蠻首領，唯巍峰刺史蒙邏盛一人爲烏蠻別種。時蒙氏勢力強大，張樂進求乃讓盟主之位于蒙邏盛。（按《畫卷》以興宗王蒙邏盛爲中心，而《南詔野史》則以其父細奴邏爲中心。《畫卷》出自唐末五代人手筆，在《野史》之前，故從前說。）

由于鐵柱會盟中白蠻大姓人多勢衆，被推爲盟主的蒙邏盛不得不重用白蠻大姓。蒙邏盛于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六七四年）立，以白蠻大姓張儉（建）成爲相。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二年）盛邏皮立，遣張儉（建）成人朝于唐。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八年），皮邏閣在唐朝支持下兼并其他五詔，遷都太和城，建立了南詔。統一雲南的閣羅鳳，立于唐玄宗天寶七年（公元七四八年），以白蠻段儉魏（段忠國，見《南詔德化碑》碑陰）爲清平官、大軍將，輔助南詔，先後大敗唐將鮮于仲通和李宓于洱海周圍，爲南詔開國功臣。天寶戰爭是唐王朝推行錯誤的民族政策造成的。代宗大歷元年（公元七六六年）閣羅鳳在太和城（今大理太和村）立《德化碑》，記述被迫反唐的苦衷，對國人說：『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唐非本心也。』唐代著名政治家李泌說：『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⑤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南詔和唐重修和好。

據文獻記載，南詔歷代君主的清平官和大軍將，十之八九是白蠻貴族。唐白居易《長慶集》卷四十《與南詔清平官書》云：『敕南詔清平官段諾突、李附覽、爨何棟、尹輔酋、段谷普、李弄傍、鄭蠻利等。白蠻多冠漢姓，其名字與漢族基本相同，『烏蠻別種』蒙氏則實行冠姓父子連名制。書中具名除鄭蠻利（鄭回）爲漢族外，都是白蠻。又《文苑英華》卷四百七十《與南詔清平官書》云：『敕段宗勝、段酋琮、獨棟、楊遷、趙文奇、蒙善政、李守約等……』七人中蒙善政是烏蠻別種，獨棟族屬不清，其餘五人爲白蠻。又隆舜時以趙隆眉爲宰相，以段義宗、楊奇鯤爲清平官，都是白蠻。白蠻是南詔的主體居民以及賦稅和兵役的主要承擔者。白蠻大姓先後幫助蒙氏統一六詔，兼并西爨。而南詔的主要敵人是其他烏蠻五詔和後來北遷依附吐蕃的烏蠻『三浪』，後者一直是南詔的心腹大患。烏蠻別種和白蠻是兩個民族，正如司馬遷說的『是以秦用由餘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強威宣……故意合則胡越爲一家，由餘、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丹）朱、象、管、蔡是矣。』^⑥所謂『意合』即爲建立統一雲南全境聯合政權的目標一致。由于白蠻漢化程度較深，生產水平較高，南詔不僅依靠洱海周圍之白蠻統一洱海地區，而且『閣羅鳳遣昆川城使楊牟利以兵圍脅西爨，徙二十萬戶于永昌城。烏蠻以言語不通，多散林谷，故得不徙……日用子孫今并在永昌城界內』。^⑦『永昌城』包括洱海周圍地區，而『永昌城界內』則限于今保山地區。所謂『言語音白蠻最正，蒙捨蠻次之，諸部落不如也。』^⑧《蠻書》稱『六詔并烏蠻』，而《新唐書》却說南詔是『烏蠻別種』，當與東爨和

六詔中的其它五詔有所區別，表現在其語言接近白蠻。這是古藏文寫本稱南詔爲「白蠻」的原因。³⁹ 由于蒙捨語音接近白蠻，不能不是它遷徙西爨的原因之一。世隆之子隆舜，自號「大封人」⁴⁰，改國號曰「大封民國」⁴¹，「封民」即「爨民」或「白人」。隆舜亦作法堯，改用效法堯舜的漢族名字。南詔王族後期已經完全白蠻化了。

南詔上承西爨文化，下啓大理國文化，其政治制度和禮樂風化極力模仿唐朝。早在南詔建立前的唐武後聖歷元年（公元六九八年）所立《王仁求碑》（在今安寧縣大石莊），碑文中天、地、國、日、月、聖等字采用了武則天頒行字體。王仁求是白蠻，曾爲河東州（今大理鳳儀，亦說在安寧附近）刺史，碑文說他「開夜郎之道，綏哀牢之圉」，自姚州以西二十餘州「俾睦其德」，可見唐代文化已深入到洱海地區。

南詔統一雲南和遷徙西爨使雲南政治經濟中心西移，促進了洱海地區科學文化和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首先，南詔大興水利，開發「殊爲精好」的山田，做到「水旱無損」。公元九世紀三十年代，在大理築了「橫渠道」，灌溉東郊和城南的田地，稱爲「錦浪江」；修建了點蒼山玉局峰頂的「高河」水利工程，將山水匯合爲池，然後下流平原，引導十八溪的水灌田。⁴² 據說唐朝羅時所創建的鄧川羅時江的分洪工程，增加了灌溉面積。⁴³ 南詔根據雲南氣候實際，制定「以寅爲正，四時大抵與中國小差」的歷法，并且掌握辨別晴雨和風力的氣象知識。其次，南詔的冶金業很發達，《南詔中興二年畫卷》二段中的犁、六段中的皮囊狀物即「橐」，作鼓風冶鐵之用；所制鐵刀劍有「鬱刀」「浪劍」和「鐸鞘」，「所擊無不洞」。⁴⁴ 出土于城址的「南詔有字瓦」上的文字，一部分借漢字增損筆畫，另一部分用漢字爲符號記白音，這就是南詔時期出現的「白文」。

南詔的重要碑刻有《南詔德化碑》，乾隆五十三年（公元一七八八年）爲王昶在大理太和村訪獲。碑高三點九米，寬二點四米。正書，殘泐甚多。碑文反映了南詔的社會情況，如「西開尋傳，祿郭出麗水之金」「建都鎮塞，銀生于墨嘴之鄉」「越賧天馬生郊，大利流波濯錦」，說明南詔金銀開采和養馬業、絲織業的發展。碑文所述南詔初期歷史，可補文獻之不足。碑文爲白蠻王蠻盛作，唐代著名文人杜光庭書。全文抒情似行雲流水，跌宕生姿，一氣呵成。書法秀整，有北周北齊遺法。現存鹽津縣豆沙關山崖上的《袁滋摩崖》，範圍約爲高零點五米，寬零點二七米，共八行，行三至二十一字，左行，正書，末行題名篆書。摩崖立于唐德宗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先是唐西川節度使韋皋先遣崔佐時與异牟尋在蒼山結盟，共同擊敗吐蕃于神川。袁滋一行奉唐廷命冊封南詔，六月從長安出